

■书 评

执著书写时代与人民的伟大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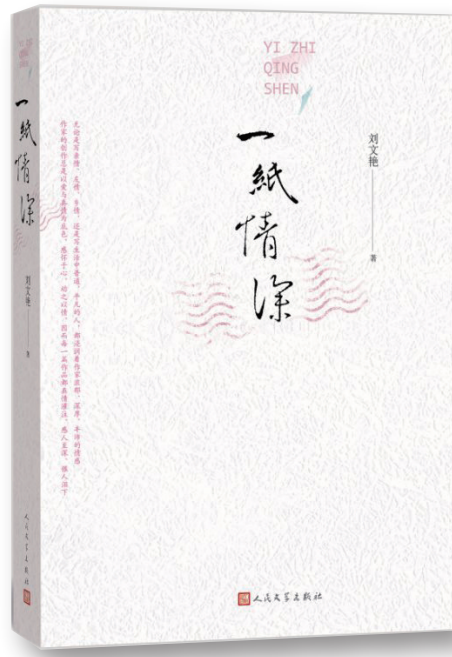
□王充闾

刘文艳文学起步较早,出版过多部作品。但我印象最深、也最为之感动的,是她最近的两部散文集:一曰《爱的诉说》,一曰《一纸情深》。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朴实无华,纯任自然的,既无石破天惊、耸人听闻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奇特的结构,精巧的运思;可是,却能牢牢地抓住读者的心,使人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久久不能放下。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一些写作者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或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情况下,刘文艳能够独张胜帜,托举出自己的“拿手活儿”,以情而文,以情感人,着实不易,因而也更加难能可贵。关于《爱的诉说》,我说得很多了;现在想就《一纸情深》谈几点看法。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有“文如其人”之说;孟老夫子讲得更明确了:“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有的论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还举出一些实例(更多的在西方)。但我还是坚持从总体上考虑,不为个别事例所动,反正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要把养德和修艺统一起来。就是说,谈作品绝对不能离开作家。

无论是作为普通作家,还是作为省作协主席,刘文艳都踏踏实实、不折不扣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指示,突出在两个方面践行:一是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二是坚持不断地深入人民,深入生活,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有了这样的根基、这样的底蕴,或者说这样的原动力,她就能风尘仆仆地走进田间地头,从雪花纷飞到山花盛开,多次走进贫困户“四处透风的三间土房”,与贫困农民结成贴心朋友,为其打井、盖房、治病等种种难心事操心尽力;她就能深入边海防女子巡逻队和她们同吃同住,一道执勤,一道演练;她就能在盛夏7月,头顶似火骄阳,进行“爱民固边”巡礼,从黄海之滨友谊桥至渤海之滨止锚湾,在3000多公里的边海防线



上,实地考察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机动大队、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切身感受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她就能重走长征路,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经张家界,转云南,走寻甸、禄劝,经丽江、迪庆,一路行军、考察、座谈、采访……已经是“坐五望六”的年龄了,但她常年坚持深入改革建设第一线,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我敢说,在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扎根基层、向人民学习方面,刘文艳是最踏实、最卖力,坚持得最好的当代作家之一。如果没有对人民、对祖国、对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深厚感情,没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的坚定信念,没有对书写时代与人民的伟大实践的执著追求,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此其一。

这就关联到刘文艳散文创作的另一强大支柱:真情实感。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审美情感的形象展现。文学作品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命的觉醒,它通过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传达出一种力量,让我们更自觉地去面对人生。文学作品的创造主体以及对象都是人,人的创作、阅读的过程,是人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生活情感、通过作品来唤起情感共鸣的过程。某一个作家将一个故事通过优美、生动的文字讲述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想象经验的积累,更为必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必须包含一定的情感取向、情感效应。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正是在爱心的滋养下,刘文艳的散文中亲情、乡情、友情浓郁、丰沛,感人至深。她曾说过:“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的爱太凝重,太深沉,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她的爱已经融入了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每当我提起笔来写人、写事,我都会记起她,像她那样把真爱投入到里边去。”

在“党员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中,她先后三次走访贫困户赵恩海家,进行扶贫帮困:请医生为他和他的妻子治病,帮他们收拾住房、购置衣物和生活用品,最根本的是通过耐心细致的关怀、开导点燃起他的生活希望,树立起兴家立业的信心。她在散文《珍贵的回

报》中,写了这么一段真情灼灼的话:“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做到,对于我的收入来说,也不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情。可是,赵恩海一家给了我深厚的回报:他的感激的泪水,他的弱妻妻子有了灵气的眼神、他的女儿甜美的微笑,一家人对生活燃起的希望之火,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给了我最大的欣慰,使我感受到助人之后的快乐,感受到真诚感激的幸福。有什么比欣慰、快乐、幸福更厚重的礼物呢?有什么比这些更厚重的回报呢?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一家人深深的感激。赵恩海一家的生活将是我永远的牵挂。”

而爱,或曰审美情感的更高体现,是她通过书写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想要告诉社会,告诉作家朋友: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发展、进步,但是,周围仍有弱势群体,需要关怀,需要支持,需要鼓舞激励。同时,在这些普通人、平凡人的身上,有许多美好的品质,有许多美德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会接受平凡,学会尊重普通人,学会从生活中感悟“仁者爱人”的至理。此其二。

其三,正是源于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深沉的热爱、灼灼的真情,因而作品具有朴挚、厚重和靠事实、靠形象说话的文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品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

由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是普通劳动者、最底层的民众,或是亲人、乡人,或是残疾、患病人群,或是打工妹、钟点工,或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民警,都是实打实凿、勤劳敬业、不尚虚华的,因而作者的文笔也是平实、质朴、亲切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不像有的作家写的是底层民众,而语言是花哨的,结构是

西化的,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像八十老翁戴上一副蛤蟆镜,罩上一件蝙蝠衫,闹噱头,出洋相。记忆中有一首宋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怎)似满炉煨榾柮(木块),漫腾腾地暖烘烘。”相对于那些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这部散文集风格的质朴、气韵的清新,确是显现出鲜明的特色。

作者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是病弱、衰老、残疾人群,一方面是“80后”、“90后”活虎生龙般的精壮男女青年民警、战士。可说是两极分明,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又有一点极其相似,那就是刚强、奋进,自强不息。

其四,这部散文集的文体特征也颇具研究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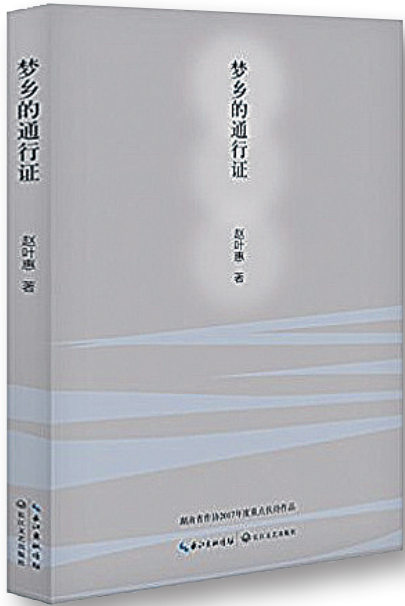
大约同作者曾就职于香港大公报的新闻经历有关,她的散文带有纪实散文、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的特色,这从许多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副刊上也可看出。应该说,它是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结合;概言之,一真二新。真实是它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现象的真实,而且是本质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再就是新闻性。一是事实新、思想新和语言新;二是时间新,讲究新闻由头,需要为此时刻写这篇作品寻找一个充实理由;三是角度新,即选题角度、立意角度和表现角度新。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纪实散文的要求是“事信言文”。也就是真实的纪事,以文学的形式、手法、语言出之。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文艳首先在调查采访上下功夫,全面地了解人物,事件的整体情况,充分地把握形象、细节;然后进行细致的构思、剪裁、选择和提炼;动笔之时,心中始终记怀着形象性与情感性。前者是外在的,诉诸视觉;后者是内在的,诉诸心灵。

以文学的笔法写真实的事件,在限制中发挥,于方寸间驰骋。真实性是它的灵魂,文学性是它的资质、风度,共同构成作品的魅力与感召力;反映在创作中,也构成了一种文体的张力。

在谈到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关系时,作家潘向黎认为,在认识到文学性对新闻性的辅助、升华之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闻性对文学性的“反哺”:对新闻性的尊崇,既是对文学性的制约,也为文学性更好地走向大众带来新的契机,造就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新闻性的要求,也给“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了风格的微妙变化。旨哉斯言!

《《一纸情深》,刘文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烟,并衍生出浓重、灼热的爱国之情,是承续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人文基因。“我从塞外早早地来了/迎接仍有些料峭的早春风/带着春意的第一丝春雨/并且遭遇一声霹雳/她们,能够治疗我的自闭症”。《江南,我来了》中这样的诗句,在集中俯拾皆是,看似平白,却有缱绻缠绵的韵致。

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周易》中早已提及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两物相杂谓之“文”,中国人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处在群体中的人应该尊重群体,强调关系,希望通过推己及人这种共性的弘扬,来达成整体的和谐。而人群相处的要义,是人群相处的礼仪道德及接应之道。叶惠用诗来表

现他崇尚德性、尊重群体、强调关系的价值追求,十分动情。《清明节写给儿子的信》,是写儿子清明节因忙不能回家陪同父母祭扫坟茔,于是他发出忠告:“但是,从明年起/清明节,你应该回来/我要带你认识通往祖宗住处的路径/你懂得在那里虔诚一跪/才能在人世真正站立”。他在《致妻

子(组诗)》中,歌颂夫妻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心心相印,对当代许多年轻人的闪恋、闪婚、闪离有着刻骨铭心的观照作用:“你眉心已有短而深的竖纹,/令我痴谜的风眼也有些黯淡。/但你回家的脚步,/我隔老远就能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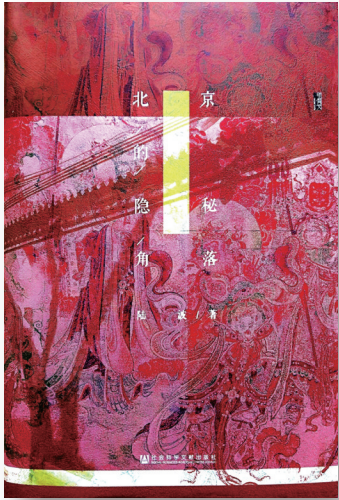
叶惠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歌吟,除了血缘上的质朴感情外,还有他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和领悟,且下力甚多,他与友人合作撰写《曾国藩生平事迹》,便是佐证。“诗礼传家”,也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他藏书、读书、书写的心得体会,也在诗中时时凸现:“每一个汉字/都像祖先的遗容/黑色的字符/镇定各色魂灵”(《读史》);“书斋,本是清瘦的/如今也肥了”(《关于书斋及其他》);“唯有这枚书签/似还残留手的余温”(《书签》)。这种书卷气,使得他的诗作在草根性的日常叙事中,又具有另一种尊贵与雅逸,从中生发出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与不衰的魅力。

《《梦乡的通行证》,赵叶惠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北京的隐秘角落》,陆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北京的隐秘角落》是“腾讯·大家”专栏“北京的隐秘路径”开设两年来的作品合集。依作者自序所述,书中文稿大体包括两类,一是通过考察北京城隐秘角落的文物遗存,来挖掘和畅想与之有因缘关联的血肉人生,二是借由追寻地标古建筑或市街区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的变迁踪迹,展现北京作为生活和思想双重空间的历史纵深。事实上,书中所收的20篇作品,大多同时糅合着从物质和文献遗存发掘世情人性、又从具体的人生遭逢推展出时代性的精神风习这样的思路 and 文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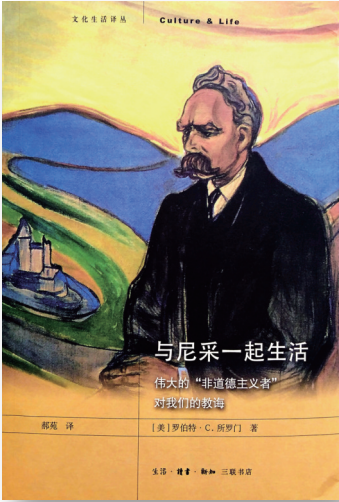
如《姚广孝,庆寿寺双塔下的过客高僧》《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对于辗转在皇权和佛法两界的明人姚广孝和清朝迎陵和尚的行迹与心态的刻画、评述;又如《一位皇后生前身后的信仰依靠》《把一辈子活成了阴影的悲剧皇后》,对于明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热心供奉礼佛,不断出资修建寺庙、印制佛经,以及清末隆裕皇后空负着尊贵的家世背景和显赫的个人身份,大半生像一抹阴影似的幽居深宫、自甘落寞,这两种外在在做派截然不同、但内心的本分善良却与宫廷女性的活法如出一辙,所作的史料钩沉和心理分析,都不仅在写作方式上显现出了用直观可感的一座建筑或一片建筑空间,来辐射和归集人事铺陈的共同特点,而且也产生了赋予古旧的历史建筑或建筑空间全新含义和全新况味的效果。

在《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两位退翁先生与樱桃沟的陈年旧事》《京城荒僻处,隐藏着跨越了六百年的国宝级文物》《明清两代大太监的一种奇异传承》《一槐一柏一柳树,一座七百四十年古镇的守望》等篇中,“北京的隐秘角落”这一主题里的“隐秘”,指向了长期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忽视或遮蔽了的城市文化史上的某些片段和侧面。由此,北京城市地理志的经典之作《帝京景物略》的两位著者刘侗、于奕正,一反在别处通常是只露其名而不显其行的符号化状态,在书中得以登场亮相,呈现他们生逢乱世而散淡自持、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的处世风度。同一条樱桃沟,穿越新旧两个时代,历经同以“退翁”为号,生平遭逢和人格境界既异中见同又同中有异的两位主人的开垦、营造,而一路迤逦变幻,出落为今天面目的一段离奇故事,才也在书中完整道出。

相形之下,令人倍加感慨的是书中以整整两个篇章,详细梳理了明清两代太监群体中的一批权贵人物,对如今尚广有遗存的京城西部和西北部以至老城区内的大量寺庙道观,都有兴建、维护之功的一段史实。并且,在直面北京城市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这一页之余,作者还深切地揭示了它背后隐含的文化肌理:社会时零者更需要寻求、建构自己的精神归宿,同时也会为此形成更急迫、更执著的实践意志和实践激情。

《北京的隐秘角落》里的各篇最初都是为在线发表和网络阅读而写的。但它形式上的那份别致和内涵上的一层厚重,也许只有在合为一个整体、出版成一本纸质书之后,才能被读者以细读的方式慢慢感知。1990年代在文坛风行起来的文化散文,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开创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都和它有一眼能够看得出来的形神两面的密切关联。但它坚守从世俗与佛教、社会中心和社会边际的交互对观的视角出发,致力于发现更具全景意义的历史本相、表达更具人性温暖的深度关怀,这样的写作姿态,已经足够和它所依托的知识基础和文学背景拉开距离。期待它的续篇在提炼更精粹的标题、锻造更风格化的措辞、保持个人意识鲜活灵动的行文穿插等方面,做得愈加自如妥帖。

《《与尼采一起生活》,[美]罗伯特·C.所罗门著,郝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出版



尼采其人其文进入汉语世界,至今已逾115年。如果有谁说,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贯穿着一部接连不断的尼采接受史,那一点也不为过。但正如这本《与尼采一起生活》的作者、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尤其是尼采研究名家——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1942—2007)所说,在流行已久的文化言论中,尼采常是作为痴迷权力、喜好残酷、对自我和他人的苦难一概持嘲弄态度的反常者和叛逆者的榜样而出现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口来谈论不道德的、冒犯宗教的、亵渎神圣的东西”。

而作者在这本书里所要做的,就是用正面的立论、阐释,对此予以彻底的辩白和澄清。全书八个部分,包括方法论和概论性质的导言与逐层申论的七章。在导言中,作者把尼采的哲学从原则性和普遍化的伦理理论的领地,释放到了个体生存论的道德哲学情境中。依作者看来,“尼采最重要的美德是,他不会否认残酷的现实或人类的悲剧,相反,他会越过我们的苦难去直视生命本身的奇诞。”这里所谓的“越过”,首先是肯定和接纳,然后才是超越其上,与普遍化的伦理学高调的凌空抽象根本不同。基于这一出发点,在第一章中,作者特别探究了尼采从主奴两种道德的区分推展开的道德批判。它表面上是以尼采自己所定义的那种起于怨恨的奴隶道德为靶子,实际上瞄准了一切“大写的道德”。这种批判思路,在第二章中,被归结为与康德式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在方法立场上直接对立的“尼采的道德视角主义”。

题为“尼采的激情”的第三章,或许会受到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读者的由衷欢迎,因为这一章着力搜集和阐释了尼采碾平情感与理性之间古老疆界的种种观点。情感不但不是非理性的,而且情感本身就具备合理性。甚至,合理性实质上也只是由情感汇聚而成,或者干脆就是情感的衍生品。按照尼采本人的这种认识逻辑,谁要把他称为“非理性主义者”,那就不仅仅是荒谬,而且还落到了恰好该遭他所持的这柄激情合成的理性批判之锤猛击的境地。在正视和重视激情对于生命价值的重要支撑作用这一点上,尼采和西方历史上公认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完全处于同一队列。

而在进一步辨析情感的深层形态及其作用机制方面,尼采又预见了弗洛伊德的心灵地形学理论,即精神分析学的自我意识结构图式。但尼采的独特和可贵之处,是他绝不在单一视角下的肯定认识上止步。对于类似弗洛伊德的“本我”或“无意识”那样的深层情感,他同样抱有冷静的怀疑,并且因此而将“无意识里的自我欺骗”归结到情感或动机之外的范畴,以至得出一种莫比乌斯环式的判断:深层情感的内核其实就是深刻的见解。

第四章“尼采论怨恨、爱与同情”和第五章“尼采的肯定的伦理学”,细化了前三章关键观点的讨论。第六章“尼采的美德:他会怎样塑造我们?”罗列、解析了尼采的论学著作和人生实践中表露过的各项美德。第七章“尼采的存在主义”把尼采的道德主张和哲学思考,放在存在主义的理念镜像中,进行审视和归纳。这些显然更琐细、也更烧脑的内容,和前面几章明快得多的有趣讨论一样,值得细读深思。